

美国动态

(半月刊)

2019年3月5日 (第186期)

内部交流 仅供参考 请勿引用

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史文：中美需携手推进两国关系健康发展

许多有几十年涉华问题经验的美国人并不认同特朗普极端、零和性的对华政策。这表明，美国仍有可能制定务实、理智的对华政策。

西班牙语裔美国人或能帮助特朗普实现连任

尽管特朗普想尽办法要在美国南部边境修建边境墙，但他正在赢得部分西班牙语裔美国人的支持，而这些人有可能帮助他实现连任。

中美关系

黑石集团 CEO 担心中国减持美国国债

CNBC 网站报道称，黑石集团首席执行官拉里·芬克 (Larry Fink) 表示，美中贸易战的结果以及目前正在进行的贸易谈判带来潜在的威胁，但这并不是因为它对市场或经济增长产生的直接影响所导致，而是贸易战对美国国债的长期影响。

芬克说：“我担心的是，中国持有 1.3 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受贸易逆差影响，这一数字一直在上升。现在，随着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减少，他们对美国国债需求减小的可能性很大。”

报道称，中国是美国主权债务的最大买家。过去几个月，中国一直在减持美国国债的持有量。根据美国财政部的数据，去年 12 月中国所持美国国债总额为 1.123 万亿美元，低于 2017 年同期的 1.184 万亿美元。贸易战拉开帷幕时，美国经济学家就警告称，中国有“万亿美元的武器”，中国可以大幅减持美国国债作为报复，这将严重破坏国际市场，并导致美国借贷成本飙升。

杜大伟：中美经贸磋商为何“加时”？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中国问题专家杜大伟 (David Dollar) 近日对中美经贸磋商的进展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首先，杜大伟认为，特朗普总统宣布美中贸易谈判进展顺利，推迟提高对华关税的计划，主要原因在于美中两大经济体互相征收的关税开始造成伤害。中国经济正在放缓，关税也在损害美国经济，双方似乎寻求达成一个务实的折中方案。

其次，外界并不了解协议的细节。杜大伟表示，协议还没有

最终确定下来，双方传递的信息是，谈判进展让人感到鼓舞，美国将推迟提高关税，这是好消息。看起来双方正在努力达成六项不同的协议。可以肯定，其中之一将是采购协议，中国会从美国购买更多的大豆和其他产品。

最后，在所谓的结构性领域，比如强制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领域，中国会做出一系列承诺，值得关注的是协议中会有什么样的执行措施。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非常重视执行问题，所以我们需要看看这些协议是什么样的，执行机制是什么。

美刊：美国撤出叙利亚将给中国带来机遇

美国《法律战》(Lawfare) 期刊网站载文称，美国宣布撤离叙利亚将对该地区带来显著影响，但许多分析都忽略了对中国这个在中东具有既得利益的大国的影响。

文章称，自 2011 年叙利亚内战爆发以来，中国卷入的程度逐渐加深，且中国还想抓住叙利亚战后重建带来的经济机遇。中国在叙利亚的经济和安全利益与其地缘政治“野心”交织在一起，中国正寻求在解决国际冲突和后期重建中发挥积极作用。美国从叙利亚撤军可能会巩固北京作为叙利亚主要国际伙伴的作用。

中国在叙利亚还有反恐利益。叙利亚有大量维族人，这是中国的主要关切。其中一些人可能会试图从中东回国，在中国境内发动恐怖袭击，而留在国外的人则可能瞄准“一带一路”项目。

中国试图将自己定位为中东地区的中立参与者，其蓝图是提供经济援助以换取资源和战略利益。中国旨在填补美国和美国领导的机构忽视的实际影响力。美国撤军所留下的缺口使北京能够输出其经济和安全模式，同时扩大自己在反恐议程中的支柱作用。

美专家：特朗普政府低估了中国的实力

“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2月24日登载摩根士丹利前首席经济学家、耶鲁大学杰克逊全球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斯蒂芬·罗奇(Stephen S. Roach)的文章称,特朗普政府低估了中国的复原能力和战略决心。文章摘要如下:

中国经济在过去几个月中的确明显走弱,但原因并非是美国“自以为得逞”的关税战略,很大程度上是中国求仁得仁的结果。美国关税的影响才刚开始有所显现,中国在2018年12月和2019年1月的对美出口同比下降约3%。

为了对冲相关风险,中国迅速着手利用其内在优势:比西方经济体更大的政策灵活性。中国过去一年内五次降低准备金要求令银行贷款增加,信贷增长也在2019年初有所抬头,这可以在年中之前支撑总体经济活动的发展。

相比之下,美国经济更像是“打了鸡血”。在2017年末的减税政策推动下,2018年经济增长率回升至约3%,比前八年平均2.2%的增速快了近一个百分点。不过,随着财政刺激措施逐渐退场,GDP增长势头估计会回落,甚至走弱的风险也在增加。

中美两国可能出现的经济增长轨迹反差明显——中国在政策推动下改善,而美国在政策限制下放缓。中国在2018年的国民储蓄率相当于GDP的45%,是美国18.7%的近两倍半。储蓄差异也凸显了两大经济体在投资支柱上的关键差异。2018年,中国的投资相当于其GDP的44%,是美国21%的两倍多。

此外,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储蓄差距可能在未来几年进一步扩大,因为看似长期性的美国预算赤字会推动国内储蓄率进一步下降。另一个复杂因素则是,在为其有限的投资潜力提供资金时,美国也需要同样长期性的经常账户赤字来补充匮乏的国内储蓄。

最后，经济实力是相对的。美国经济目前的实力似乎稍纵即逝。它的短期复原能力已被消磨甚多，还可能在令人忧虑的长期基本面下进一步减弱。而中国的情况则相反：在相对稳固的长期基本面背景下，目前的短期疲软应该会在年中得到逆转。这一现实将给美国谈判者们当头一棒，因为他们误读了中国的实力和表面贸易协议的空洞利益。

史文：中美需携手推进两国关系健康发展

许多有几十年涉华问题经验的美国人并不认同特朗普极端、零和性的对华政策。这表明，美国仍有可能制定务实、理智的对华政策。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网站近期登载该智库中国问题专家史文（Michael D. Swaine）的文章，分析了中美关系总体下滑的原因和解决方案。文章摘要如下：

北京和华盛顿都应为如今中美关系的严重下滑负责。尽管特朗普政府无疑应为此负主要责任，但在中国在很多方面加剧和推进了华盛顿的不当政策。要真正理解两国关系，就必须准确评估两国政策圈的情况，这是让中美走上更好道路的唯一合理起点。

在许多方面，特朗普对华政策的转变是美国精英阶层对华态度转变的极端和夸张版本，而这种转变是根本性和跨党派的。两党许多精英摒弃了务实、谨慎乐观的合作性接触和对冲策略，转而接受一种意识形态色彩更浓、疑心更重的悲观信念，即中国一直通过欺骗和欺凌的方式寻求在亚洲和其他地区取得主导地位，而美国却一直玩忽职守。

这种变化的原因有多种。就美国而言，原因包括（至少从2007

年 2008 年金融危机开始)对美国的制度和全球领先地位的担忧加剧,一种过度紧张的国家主义崛起,担心中国肯定会寻求削弱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地位。这些焦虑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并利用了美国政治中长期存在的、根深蒂固的偏执,这种偏执在一定程度上不受逻辑和事实的影响。

中国在许多方面促进和加强了对华态度的消极转变。北京在主权问题上变得更加强势,对其他国家使用经济和其他形式的胁迫手段的意愿增强,对本国民众的“控制”进一步收紧,对外国公司的限制更加严格,更加咄咄逼人地开展各种形式的间谍活动,尤其是网络间谍活动。

对中国的这种质疑不同程度地存在于美国政界、学界以及商界。但有趣的是,美国公众似乎并未完全接受这种观点。譬如,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去年 10 月的一项调查显示,仅 39% 的美国人将中国崛起视为对美国关键利益的重大威胁。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何彭斯等人在演讲时专门“吓唬”普通美国人。

此外,大量有几十年涉华问题经验的人并不认同特朗普极端主义、零和性的对华政策。这些人反对特朗普的贸易政策,不认同有关中国想要颠覆整个全球秩序的说法,也不认为中国在全球推行债务陷阱外交。这表明,美国还有可能制定务实、理智的对华政策。

缺乏充分沟通,对彼此红线和意图的认识不足,误判很容易升级为对对方决心的考验,导致双方都不愿做出妥协。对于这种令人不安的状况,政策制定者该如何应对?

首先,两国有影响力的个人(不仅仅是中美关系专家)需要更有力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他们需要呼吁双方停止鲁莽的言论,转向有关共赢的安抚性宣传言论,并采取温和的折中措施,处理两国关系中导致不满和怀疑的主要根源。

在短期内，中国需要集中精力处理令西方企业不满的根源和网络间谍活动，同时用行动表明中国愿意让西方资本和商业利益参与到“一带一路”等中国经济计划中来。

与此同时，美国国会应就亚洲未来的战略平衡及其对美国政策的影响举行听证会。听证会应全面评估美国、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所拥有的军事、经济、政治、外交和软实力资源的中长期变化会如何影响地区稳定。评估的意义是进一步确认和定义亚洲的格局变化，并确定最可行有效的政策选项。此外，政策专家和政界人士需要提供支持，对可能有助于更有效管理美中危机的额外机制和程序进行中立审查。

一个更加稳定的亚洲不会在一夜之间出现，更不用说更加稳定的中美关系了。这种转变只能在经验丰富的外交官、商界领袖和军官的指导下发生。他们对重大利害关系有强烈的认识，并清楚地认识到现状持续的危险性。两国关系最终应变成竞争性更强、更均衡，但在许多方面仍然互利的合作关系。

美国外交

美国的盲目野心可能让其成为全球竞争的牺牲品

《国家利益》网站登载美国兰德公司政策分析师阿里·韦恩（Ali Wyne）的文章称，特朗普政府谨慎地将美国的重心由反恐转向“长期战略竞争”，但任何国家在参与广泛的全球性竞争前，都必须明确前进的道路。因此，华盛顿至少需回答四个基本问题：

首先，谁是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中国与俄罗斯多次同时出现在特朗普政府的几份重大国家战略报告中。许多分析人士称北京是“正在复苏的修正主义者”，而莫斯科则是“摇摇欲坠的机

会主义者”。事实上，历史告诉人们，衰退力量可能会造成更严重的短期干扰。

第二，美国具体参与了什么竞争？尽管美国在实力上有绝对优势，但其外交政策未确定优先事项，因此无法支撑美国的远大抱负。

第三，也许最重要的是，美国的最终目标是什么？是为了保持美国目前的领先地位？为了阻止中国的综合国力发展到一定水平？还是阻止中俄从伙伴关系转为结盟？

第四，如果美国未能确定长期目标并且衡量取得的进展，那么怎样让本国经济和社会为无限的竞争做好准备？

医生需要对症下药，国家也一样，首先要明确主要应对的是哪些挑战，然后才能制定行动方案。如果美国让竞争不可避免，那么必然会将行动与成果混为一谈，进而加剧国内资源与外部承诺之间已有的差距。

库什纳的“中东和平计划”还未出炉可能就已失败

《政客》杂志 2 月 25 日载文称，特朗普的高级顾问库什纳近日与海湾国家领导人会面表明，特朗普正在全力推进“中东和平计划”，但目前的地区环境不利于其实现雄心。

库什纳最初把讨论局限于经济方面，但阿拉伯相关国家的兴趣不大，于是他近期宣布该计划在政治上将集中在“解决边界问题”上。然而，目前巴以和解取得巨大进展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以色列右翼的党派联盟已经开始游说反对特朗普的计划，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人妥协的动力不足，而巴勒斯坦内部混乱导致以色列人没有对话的伙伴。此外，库什纳面临的挑战还包括，巴勒斯坦一年前断绝了与特朗普政府的联系。

这种状态最后可能导致进入“死胡同”。巴勒斯坦可能会拒绝美国所提的任何其认为对本国不利的建议。由于以色列国内对让步的支持有限，内塔尼亚胡政府肯定倾向于“有条件地让步”，且最后把导致美国计划胎死腹中的责任推给巴勒斯坦。

不过，也不是所有人都不满意。尽管巴以和解没有进展，但以色列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继续迅速发展。库什纳以及特朗普政府的其他人有一定责任，但奥巴马也脱不了干系，伊朗核协议将以色列和受伊朗威胁的邻国走到一起。唯一悬而未决的问题是，在巴以问题未解决的情况下，这种合作能走多远。

美媒称特朗普在越南未接受“糟糕协议”是正确选择

《纽约时报》2月28日报道称，在越南峰会上，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显然寻求只关闭一些核设施来换取美国彻底结束制裁，因此，特朗普不接受协议是正确的选择。

报道称，在1986年冰岛雷克雅未克峰会上，里根总统拒绝接受与俄罗斯达成军控协议，因为他认为协议有缺陷。一年之后，俄罗斯提出了更好的条件。美朝之间也可能会发生类似的事。

不过，未来还存在重大风险。最重要的是，朝鲜可能会重新测试核武器和弹道导弹，因为这将标志着紧张局势大幅升级，引发对战争的担忧。不幸的是，朝鲜只有在作出挑衅行为时才会受到关注，其领导人已经意识到，最好的杠杆是发射导弹、引爆弹头或启动核复合体。

特朗普在峰会前的表现也不尽如人意，他表达出迫切想要达成协议并且有可能“取得巨大成功”，所有这些都可能导致金正恩提出他认为特朗普可能会作出让步的要求。对正常的总统来说，峰会交易基本上提前就商定好了，但特朗普对这种细致的外交过

程缺乏耐心，过于相信人际关系能带来突破。

本次峰会失败也凸显了特朗普在新加坡峰会中被误导，他不明白金正恩所说的“无核化”与美国所提的“无核化”含义不同，并且给了金正恩巨大的合法性礼物而没有获得任何相应的回报。

兰德公司：中俄给美国带来的挑战有差异

自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外交政策重点重回大国竞争，在若干政策文件中将中国和俄罗斯明确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兰德公司近期发布报告，分析了中俄两国给美国带来的挑战有何不同。报告摘要如下：

俄罗斯和中国都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了独特的挑战。俄罗斯不是一个同等或近似同等的竞争对手，而是一个装备精良的“无赖”国家，试图颠覆一个它永远无法占据主导地位的国际秩序。相比之下，中国是一个同等的竞争对手，中国希望塑造一个它可以追求主导地位的国际秩序。

这两个国家都试图改变现状，但俄罗斯袭击邻国，吞并领土，并支持试图分离更多领土的叛乱分子。俄罗斯在国内外暗杀反对派，干涉别国选举，颠覆海外民主国家，并努力破坏欧洲和大西洋机构。相比之下，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主要基于更积极的措施：贸易，投资和发展援助。这使得中国成为一个不那么直接的威胁，但却是一个更大的长期挑战。

在军事领域，俄罗斯可以被遏制，但中国无法被遏制。中国在东亚的军事优势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长，这将迫使美国承担更大的成本和风险，以确保现有的承诺。但是，世界领导力的竞争将会呈现在地缘经济领域，而不是地缘政治领域。正是在地缘经济领域，美国和中国在全球影响力上的平衡开始转向有利于中

国的一边。

基于上述挑战，报告向美国政策制定者提出以下建议：

在安全领域，美国应该继续在东亚和东南亚保持存在，接受更大的成本和风险以抵消中国日益增长的军事能力。与此同时，华盛顿应该帮助其地区盟国和合作伙伴建立他们自己的反介入和区域拒止系统。最后，认识到其谈判地位将逐渐被削弱，美国应该利用任何机会解决问题，消除中美紧张局势。

在经济领域，美国需要在国外市场更有效地竞争，坚持和加强国际贸易和投资准则，并激励中国在这些规范范围内运作。鉴于从长远看，中国致力于在技术领域获得领导地位，以及这种领导地位带来的潜在优势，美国也需要改善其创新环境。措施可包括为研究提供更多资金，保留受过美国教育的外国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以及有助于将产品和流程改进引入企业和市场的监管改革。

在回应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时，美国应该采取行动，确保自己优先进入世界上最大的市场，即欧洲和亚洲的工业化国家；协助各国加强与世界经济的联系；与伙伴合作，确保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更加透明；增加对美国出口商和投资者的支持。

面对所有这些挑战，美国与盟国和贸易伙伴协调行动，将会取得更大成功。

美国政治/其他

美国公众对贸易的态度有所转变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网站登载该智库高级顾问威廉·赖因施（William Reinsch）的文章称，过去两年来，美国公众对贸易的态度正发生变化，这可能对特朗普的政策预期产生影响。文章

主要观点如下：

与其它议题相比，美国公众认为贸易的重要性并不高。在公众认为政府和国会应当作为优先事项的 18 项议题中，全球贸易居于末位。围绕贸易问题的党派分歧较小，仅次于就业、社会安全等议题。

多于半数的公众仍然认为贸易协议是好事。2016 年大选后，公众对贸易协议的看法急转直下，认为贸易协议是好事的公众比例从 2015 年的 58% 降至 2016 年末的 45%。但自 2017 年以来，该比例持续上升，2018 年该比例上升至 56%，接近历史最高水平。

对特朗普贸易政策的支持存在较大的党派分歧。这并不令人意外，无论是否同意其观点，共和党人都会支持特朗普。在同样情况下，民主党人也会如此行事。但随着支持共和党的选民的意见逐渐向支持贸易的方向倾斜，这种支持会变得愈加困难。这对国会的政客们可能是好消息，但对特朗普而言却并非如此。

若支持共和党的选民向更加支持贸易的立场转变，若贸易在公众的优先事项中仍属边缘问题，那么特朗普利用不公平贸易等言论动员共和党人的能力就会被削弱。这也向特朗普释放了一个重要的信号——因为他可能再也无法像其预想的那样，从其主张中获得那么多的政治利益。特朗普已经让贸易成为一项全国性议题，在此过程中更多美国人不得不思考自己在贸易问题上的立场。

穆勒并非特朗普团队面临的唯一威胁

《政客》杂志网站近日载文称，虽然特朗普团队中的核心成员可能逃脱穆勒的指控，但还面临其他威胁。

最近几周，几位与特朗普关系密切的知名人士表示，他们将安然度过穆勒的调查。特朗普本人宣称，司法部官员告诉他的律

师，他不是特别检察官的调查目标。他的家人也发出了类似的信号。但穆勒并不是总统及其家人、助理面临的唯一威胁。

纽约联邦检察官正在调查特朗普 2016 年的竞选活动、就职典礼和商业活动。国会已经向司法部提供了数十份听证会记录，其中可能包含宣誓后的谎言。据悉，华盛顿特区的联邦法院摆放着一叠密封的起诉书，说明特朗普圈子里的一些人可能已经被起诉，只是公众不知道而已。

几位接近特朗普政府的消息人士说，真正的威胁不是穆勒对特朗普的助理在 2016 年竞选中是否与俄罗斯勾结的调查，而是总统周围的人会因为误导议员而被起诉。穆勒可以在调查结束之前起诉其他人，也有可能他已经向联邦法院提出了更多类似定时炸弹的指控。

美媒称特朗普与莱特希泽之间的矛盾上升

彭博社报道称，据特朗普政府内部人士透露，特朗普与其首席贸易谈判代表莱特希泽因对华贸易问题，彼此间的矛盾上升。

特朗普在白宫与美中谈判代表会面，期间他与莱特希泽就“谅解备忘录”一词发生小争执。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事后抱怨称，莱特希泽在中方谈判代表和媒体面前公开纠正他，让他陷入尴尬境地。此外，特朗普还对莱特希泽仍还未与中方达成协议感到失望，他认为达成协议越来越重要。

据一位接近特朗普政府的消息人士称，特朗普近几个月对他的“贸易沙皇”感到失望，尤其是随着与中国的贸易战升级，美国股市在 2018 年末急剧下跌，创下自“大萧条”以来最糟糕的年末表现，并创下自 2008 年以来的最大年度跌幅。

莱特希泽一直是对华鹰派，他是特朗普政府对中国输美商品

征收关税的政策设计者。虽然特朗普宣称自己是“关税侠”，但他也越来越渴望与中国达成历史性协议。有分析认为，莱特希泽在美中贸易会谈中的作用正在下降。消息人士称，莱特希泽的挫败感尚未达到辞职的程度，但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官员一直在打电话给相关人员，感谢他们就美中会谈公开表达强硬立场。

西班牙语裔美国人或能帮助特朗普实现连任

尽管特朗普想尽办法要在美国南部边境修建边境墙，但他正在赢得部分西班牙语裔美国人的支持，而这些人有可能帮助他实现连任。

美国《政客》杂志近日载文称，特朗普正在赢得部分西班牙语裔美国人的支持，而这些人有可能帮助他实现连任。文章摘要如下：

特朗普 1 月 20 日在推特上发文称，他在西班牙语裔美国人（Hispanic-Americans）中获得了 50% 的支持率。特朗普写道：“刚刚听说我在拉丁裔选民中的支持率上升了 19%，达到 50%。这是因为他们比任何人都更了解边境问题。他们想要安全，而这只能靠一堵墙来实现。”

当时大多数观察人士对此不屑一顾，毕竟特朗普竞选时指责墨西哥将“强奸犯”送过边境，上任后实施“骨肉分离”政策，并把建墙阻挡移民作为执政重点。就连给出上述数据的民调机构马瑞斯特舆论研究所（Marist Institute for Public Opinion）也表示，数据可能存在巨大误差，且样本中共和党人比例可能过高。

然而，一个月后，特朗普正在佛罗里达等州积极争取西班牙

语裔美国人的选票。与此同时，民意调查显示马瑞斯特舆论研究所的数据可能是靠谱的。

Politico 与 Morning Consult 联合发起的一项民调发现，特朗普的支持率整体反弹至 45%，其中，西班牙语裔的支持率大幅跃升至 42%。尽管调查指出，这一结果存在很大误差，但其他多项民调显示，特朗普在西班牙语裔中的支持率维持在 35% 左右。

现在摆在民主党人面前的残酷事实是：如果特朗普在西班牙语裔选民中的支持率迅速上升，那么他可能正在赶上或超过 2004 年小布什赢得的 40% 的支持率。如果特朗普在西班牙语裔选民中的得票率比 2016 年高出 12 个百分点，那么民主党可能会失去佛罗里达州、亚利桑那州、佐治亚州和北卡罗来纳州。这意味着民主党需要横扫密歇根州、宾夕法尼亚州和威斯康星州，才能获得入主白宫所需的 270 张选举人票。此外，如果没有西班牙语裔选民压倒性的支持，民主党要想控制参议院就更难。

事实上，西班牙语裔美国人是一个庞大、多样化的群体，而不是铁板一块。总的来说，西班牙语裔美国人在政治上越来越像非西班牙语裔美国白人。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现在三分之二的西班牙语裔选民出生于美国，他们支持特朗普的可能性远远高于入籍的移民。有研究表明，西班牙语裔民主党人的自由主义色彩远不如党内其他人，譬如，西班牙语裔美国人中大约一半是天主教徒，在堕胎等社会问题上偏保守。

有迹象表明，2020 年特朗普将回归一种“更可靠”的方法，即把民主党人定性为极端左派分子。他和其他共和党高层正在抨击民主党在堕胎和税收上的立场，并称民主党在医保和气候变化问题上的立场是“社会主义”。他口头支持推翻委内瑞拉“独裁者”马杜罗，以吸引佛罗里达州的古巴裔美国人。有充分理由相信，这些努力将对西班牙语裔选民产生效果，或者至少足够有效。

与此同时，民主党并没有赢得西班牙语裔选民的称赞。民主党在国会两院的领袖佩洛西和舒默，他们在西班牙语裔选民中的支持率都很低，而家喻户晓的西班牙语裔民主党议员也很少。最重要的是，大多数西班牙语裔美国人过得不错，西班牙语裔美国人的失业率的确处于创纪录的低水平。此外，尽管特朗普发表了煽动性的言论并引发了恐惧，但大多数西班牙语裔家庭的生活并没有太大变化。尽管被逮捕的移民人数有所上升，但遣返人数与奥巴马政府的高峰时期相比略有下降。

尽管西班牙语裔美国人与特朗普的良好关系可能不会持续很长时间，但这确实意味着，最终的民主党候选人不能简单地认为，西班牙语裔选民会蜂拥到投票站阻止特朗普连任。

本刊所载文章的观点不代表本刊编辑部观点，仅供读者参考。

编辑部：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地址：上海市淮海中路622弄7号社联大楼201室

邮编：200020

电话：021-33665148

工作邮箱：bianjibu@sias.org.cn